

引言 少年顽冥 命运多舛

蒋介石在变幻莫测的中国近代史上可谓叱咤风云的人物，系浙江宁波地区奉化县溪口镇人，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改名中正，字介石，生于光绪十三年，即 1887 年 10 月 31 日。他从一个乡间愣头愣脑的“无赖”小童，进而东渡扶桑学习军事；从一个诛杀同党为人所不齿的上海滩“混混儿”，到赴汤蹈火舍身杀贼的革命党人；从一个因怀才不遇而常开“小差”的粤军将领，一跃而为孙中山须臾不可离的心腹助手；从“高呼”国共合作口号的黄埔军校校长，跃身而为北伐军总司令；从一个肆意剿杀中共和爱国人士的刽子手，到被迫抗日的赫赫统帅；从戏言和平大摆“鸿门宴”的抗战“功臣”，堕落成为内战煽风点火的独夫民贼……

蒋介石从乡野顽童成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与古代皇帝毫无二致的风云人物，不可不谓龙门高跳，平步青云。但是，谁又曾料想，蒋介石身为民国军政要人，一生戎马倥偬，几十年出生入死，历遭险难。其间既有北洋军阀对他的多次悬赏通缉，也有援闽作战中咄咄逼人的敌军追杀；既有政敌想置他于死地，也有革命派的捉蒋杀蒋计划；既有爱国志士的搏命刺杀，也有黄埔学生的秘密倒蒋；既有日机有的放矢的狂轰乱炸，也有盟军心怀叵测的倒蒋风波……不一而足。令人惊奇的是，每当大难降临的生死关头，蒋介石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一离奇经历一直令时人及史学界大惑不解，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史谜”。

其实，蒋介石一生命运多舛，生与死常在转瞬之间变幻莫测，这一特点起始于他的孩提时代。

1891年农历大年三十，这是中国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车水马龙，人流涌动，男孩女童换旧着新，欢蹦雀跃，不时地燃放鞭炮，整个镇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蒋家的玉泰盐铺也不甘冷清，照例贴红挂绿，张灯结彩，分外热闹。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字玉表）“以商业起家，而尤精于盐务，家道以之渐亨”，年老时把家政都交给了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字肃庵）。那时正是“洪杨之季，盐业顿衰”。蒋肇聪“殫精竭力，经营数载，家业重振，盐务滋盛”。蒋肇聪在溪口镇上开设了一家玉泰盐铺，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又有薄田三十余亩，属中产殷实之户。

在我们古老的国度里，饮食文化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年夜饭往往是辞旧迎新、欢度佳节的高潮。蒋家也不例外。此时，玉泰盐铺后院的厅堂里，蒋斯千邀集全家三代同堂围坐在八仙桌旁，品尝节日的佳肴，共享天伦之乐。也许是节日的喜庆气氛过于浓烈了，桌上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使得连日来一直处在兴奋状态的小瑞元激动得不能自己。瑞元是蒋介石幼年时代的奶名。这一年，他刚刚三岁，活泼好动，成为蒋斯千的孙辈中较为受宠的一个。瑞元在嬉闹之中，突发奇想，竟想试一试自己的喉咙到底有多深，将一根筷子直挺挺地顺着食管插了进去。霎那间，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突涌而至，瑞元发出一声沉闷的尖叫，随之白眼一翻，冷汗直冒，倒在母亲王采玉的怀里，不省人事。王采玉眼疾手快，慌忙将筷子从瑞元嘴里拔出，拼命摆弄瑞元的身子，呼喊着儿子的名字。可是，小瑞元依旧不吭一声，王采玉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几乎晕厥过去。在坐的老少爷们也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起来，个个面面相觑。

除夕之夜出现这等不幸不吉之事，自然令祖父蒋斯千心中忐忑不安，一宿难以成寐，生怕孙子日后成为哑巴，或者更有不幸。他时不时地隔窗询问儿媳妇王采玉：“瑞元好点了吗？”

清晨，瑞元渐渐苏醒过来，王采玉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当瑞元听到爷爷两次前来探问病情时，便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声答道：“爷爷，我好了，喉咙一点儿也不痛。”说完还在床上翻了一个筋斗。蒋斯千大喜过望，全家人转忧为喜，欢天喜地地给亲朋好友拜年贺春。

蒋介石长到五岁时，更是顽冥不化。那年时逢中秋佳节，家人都聚在院子里赏月拉家常，而经常有奇异举动的瑞元，却舍天上明月而不望，发现院里的水缸中有一轮明晃晃的皎月，便生好奇，以小小的身躯，踮着双脚，勾着腰肢，爬上缸沿伸手去捞。原本以为水中明月唾手可得，岂料想脚尖用力过猛，结果头重脚轻，一个筋斗栽进了水缸里。正聊得起劲的王采玉发现儿子不在身边，又突闻“扑通”一声响，心知不好，便央家人四处寻找，找来找去，最后才发现瑞元浸在缸水之中。当家人手脚麻利地将瑞元捞起时，他已是奄奄待毙了，令其母王采玉又好自伤心了一番。

关于蒋介石的此一遭遇，又一说是那年冬天，蒋介石向结了冰的缸中捞冰，结果倒栽缸中，撞破薄冰，沉入刺骨冰水之中，要不是被家人及时发现救起，这条幼小的顽皮生命就算是交待了，中国近现代史恐怕要改写了。

第二年，蒋介石才六岁，就去上了学，学名蒋志清，自此更加顽劣淘气。蒋介石在后来所写的《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槊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上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又说：“幼性顽钝，弗受绳尺。”当时的官书也说，蒋介石“是一个顽皮的儿童，他最喜欢的是恶作剧”，并经常挨母亲的捶打。蒋介石七岁时，有一次随祖父蒋斯千到法华寺拜佛，一路上不得安静，时而抛石扔土，时而大吼大叫，从陡坡上向下急奔，被摔得头破血流，鼻青

脸肿。

玉泰盐铺临街，而溪口镇上的这条唯一的长街便是沿着剡溪伸展，清清的溪水，嶙峋的怪石，无疑对他产生极大的诱惑。每当夏天到来，蒋介石的水中历险便会时有发生。他经常躲过家人的强力看管，泡在溪水中嬉玩，雨后涨水，丝毫不加顾忌，照旧从高处一跃而跳，扎入水中，有好几次险些被激流卷走淹死。

在游戏场上，蒋介石也是把好手。由于家庭富有，生活优越，祖父蒋斯干和父亲蒋肇聪爱如至宝，娇生惯养。因此，小小年纪就成了顽童，性格顽散傲慢，嬉戏无度，难以约束。蒋介石常做恶作剧吓人，有一次夜里，竟扮成凶神恶煞的魔鬼，把同伴吓瘫在地。蒋介石自小就有一种领导欲，经常自充群童的“头头”，如有人不听从他，就联合一班和他要好的儿童，殴打不听从他的儿童。上学时，每于课后便要邀集一大群少年同学到溪边沙石滩去作械斗游戏，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手持竹刀竹枪，排列阵势，由他发号施令，互相攻斗。看谁打得不狠，他就用棍棒在后督战，高喊道：“脓包，脓包！”大家互相打得头破血流了，蒋介石则欣喜若狂，捂着伤口说：“杀得好，杀得妙！脑袋破，呱呱叫！”可是，母亲王采玉每次见到这般情景，便会痛哭流涕，唯恐儿子在械斗中生出什么意外来，对他管教越发严厉起来。但是，蒋介石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有一次，王氏实在气愤不过，把他关在房子里，随手拿起一根棍子要打他，他急忙钻进床下去躲藏，不肯出来。王氏举棍向床下捣他时，适有邻居来找她，蒋介石乘王氏开门之际，迅速从床下钻出来，猛推王氏一把，夺门而出，逃之夭夭，王氏追之不及，泣不成声。因此种种，溪口镇上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说他“瑞元无赖”。

可是，就是这位“瑞元无赖”，尽管儿时命运不济，险象丛生，但均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也许正是由于蒋介石有了儿时无数次的特殊经历，才使他在日后的军政生涯中，每遇险境，都

能轻车熟路，泰然处之。无怪乎一些趋炎附势的文人政客吹捧蒋介石“坐怀不乱”、“处变不惊”。

第一章 讨袁护法 几遭追杀

一、陶成章饮弹沪上 蒋介石逃亡日本

蒋介石一生虽反共反人民，罪恶多端，但在青年时代却有着一段一直令他引以自豪的经历，那就是先后追随陈其美和孙中山从事反清反袁斗争，出生入死，捞了些资本。不过，他刚刚开始反清革命，就险些被内部的革命党人“革”了命。

1906年冬，争强好胜、爱打爱闹的蒋介石告别了家乡溪口镇，考入了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前身），开始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这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创建了中国同盟会，到处宣传反清倒清的革命思想。蒋介石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也同情和接受了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具有爱国热忱。传说他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一个日本军官在给学生讲细菌课时，手拿一块泥土打比喻说：这块泥土就产生四亿个微生物，就像四亿中国人寄生在里面一样。面对日本军官肆意污辱之语，蒋介石按捺不住气愤，冲向讲台把泥块掰成八块，指着其中一块对教官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也像五千万微生物，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泥土中？”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使日本军官目瞪口呆，面红耳赤。当他看到蒋介石没留辫子时就咆哮着说：“你、你、你是革命党！”蒋介石则忿然说：“只问你比喻对不对，不要问这题外事！”这一爱国故事编进了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小学课本里。

1908年春，蒋介石又考入了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第十一期，学习炮兵专科。东京是同盟会的创建地，革命党人云集。在留日期间，蒋介石结识了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在振武学校期间，蒋介石曾给其表兄单维则寄过一张照片，上面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反映了他当时一定的民族意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上海准备响应起义的陈其美电召蒋介石回国。此时，蒋介石正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潟县高田市（现上越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充当二等兵，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闻陈其美电催回国，便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归国。长冈外史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归国”为由，对蒋的请求坚决予以拒绝。于是，蒋介石就转而与联队长飞松吾洽商，终于获得了四十八小时的短假，同时准假的还有张群等人。于是，蒋介石就同张群秘密离日。但日本有规定，当兵的在准假期内未归队，就作为逃兵处置，由宪兵缉查。蒋介石乔装打扮，换上了日本的和服，张群换上了日本的学生服，才躲过了日本宪兵的严密缉查，由高田乘火车到了东京，向同盟会东京支部领取旅费，偷偷回到上海。这可以说是蒋介石从事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历险经历，由于他的机智和勇敢才幸免于难，否则就成了日本人的阶下囚。

回国后，蒋介石于11月亲率二百名敢死队员攻占了杭州城。不久，又回上海替新任沪军都督陈其美整编沪军第五团，由蒋任团长。这一年，陈其美、黄郭和蒋介石换帖拜把子，结为盟兄弟。

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革命团体，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内部矛盾重重。尤其是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章太炎、陶成章出于狭隘私利，诽谤攻讦孙中山，起草《孙文罪

状》，在东京等地掀起“倒孙风潮”，力图壮大光复会声威，取同盟会而代之。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陈其美对此十分不满，双方隔阂渐深。1911年7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上海嵩山路沈宅开会，二人话不投机，很快发生争执，陈其美竟掏出了手枪，吓得陶成章几天后匆匆离沪，逃往南洋。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回国。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都督之职被陈其美占有，陶成章十分不悦，对陈其美“间有讥评”，并准备在上海“练兵”，锋芒直指陈其美。陈其美大惊失色，杀陶之心油然而生。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陶成章见势不妙，于是避居上海客利旅馆，后又迁居国民联合会、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等处。12月30日，陶成章移居广慈医院。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而任。从当时舆论来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人甚至说：“继是任者，惟有陶焕卿（成章），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但潜居上海的陶成章深知陈其美觊觎此职已久，不敢忘却自身所处困境，遂于1月12日发表通电，推荐属同盟会系统的蒋尊簋继任浙督，意在向陈其美等人表示，自己无意于争权。但是，陶成章的这一意图并未被其旧属领会，沈荣卿等一味致电陶成章，宣称“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要求陶早日回浙，筹备一切，不能“一再退让”。

陶成章一直是陈其美政治仕途中的心腹大患，此人不除，难成大器。陈其美当即召来蒋介石，将此计划和盘托出。蒋介石深知责任重大，当然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后来，蒋介石在他的《中正自述事略》中也自白说：“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只是当时的陶成章因知风声渐紧，住所、行踪飘忽不定，给刺杀增添了难

度。

同日，蒋介石以沪军标统身份主动找到光复会系统的张伟文、曹锡爵，向他们反复表示，本人与陶成章本无意见，想亲见陶成章将此事当面言明，以免相互之间加深误会，贻害革命。张伟文、曹锡爵不知有诈，当即与蒋介石决定下午 2 时在光复会机关一晤。在蒋陶见面的时候，二人“融洽异常”，谈得非常投机，渐渐地陶成章失去了警惕。蒋介石趁热打铁，询问陶成章的地址，陶成章不假思索当即书一条相告。蒋介石拿到地址，如获至宝。当夜 12 时，有人持函到广慈医院，声称是通过蒋介石转交的杭州快信，署名“临时协会”。13 日，陶成章将该函出示张伟文，张伟文认为浙江只有“临时议会”，而无“临时协会”，对此表示怀疑，但陶成章并无戒心。

14 日凌晨 2 时，两位西装革履的不速之客突然窜至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他们敏捷地跳墙、上楼，走进头等房间第六号。这时，陶成章已面里而卧，闭目养神。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时，西装客飞速掏出手枪，一阵狂扫之后，扬长而去。子弹从陶成章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当日，陶成章不救而逝。

陶成章虽然与孙中山有许多龃龉，但毕竟是革命阵营中的有功之臣。他的死，必然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陶成章被刺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电陈其美，内称：“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强烈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可是，孙中山哪里知道，他的军事干将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使者！

陶成章被刺，全国舆论哗然，上海更是炸开了锅。1 月 17 日，《大共和日报》忿然批评道：“弹丸匕首者威敌之具，所以济军队之不足也。若以纤芥微嫌，循环报复，甚至片言龃龉，亦借

此以泄忿，甚惧乱之无涯矣。”19日，该报再次发表时评说：“恃拳铤之威而强人以从我，否则必杀之，拳铤之专制。执拳铤者，尝愿革专制而希共和者也。”

经过审时度势、明察暗访，时人已普遍怀疑刺陶案系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于是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蒋介石。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旅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众人当着陈其美的面，议论纷纷，谴责此次卑劣的暗杀行动。沈剑侯一针见血地说：“陶公之死，非死于汉奸，非死于私仇，必死于怀挟意见之纤竖，吾同胞当必代为雪仇。”孙铁舟更是义愤填膺地说：“陶君之死，必死于争竞权利之徒，如嗣后有挟私害公者，当以手枪杀之。”言毕动情，将手枪“啪”地甩在桌子上。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昂，充满了誓为陶成章报仇雪恨的火药味。

陈其美本想包庇蒋介石，以为风头一过，便会风平浪静，平安无事。但是全国上下“缉凶”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光复会的激进分子甚至组织了暗杀团，非置蒋介石于死地不可。陈其美怕长此以往，惹火烧身，殃及自己，急劝蒋介石远走高飞，静候时变，以图东山再起。蒋介石也深知上海为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辞职东游”，逃到日本去躲避，从而避开了光复会的报复。刺陶的另一个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却被当地的光复会会员雇人杀死。蒋介石在日本闻讯，不免倒吸几口凉气，庆幸自己比王祝卿逃得更远，令光复会会员鞭长莫及。

二、袁世凯通缉悬赏 蒋介石脱险萧王庙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摧毁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在南京成立了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国人纷纷剪去在脑后拖了近三百年的辫子，头脑感觉一阵轻松，一种从未有过的欢欣涌上心头。

然而，中国历史并未从此卸下重负。首鼠两端的清王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凭借手中精兵良械，大耍政治手腕，花言巧语，骗取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信任，篡夺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认为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业已实现，今后唯一目标就是为“民生主义”而竭尽全力。于是拿着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状，兴高采烈地去考查、筹办，以实现建设二十万公里铁路的宏伟蓝图。就在这时，权欲熏心的袁世凯向着革命党磨刀霍霍了。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了国民党的著名领袖宋教仁。接着，袁世凯倒行逆施，不经法定手续，擅自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财团签订了总额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借以扩充其北洋军队，镇压国民党。“宋案”和“善后”大借款事件如晴空霹雳，震惊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3月27日，正在日本考察访问的孙中山闻讯后，匆匆赶回上海，发出“先发制人”号召，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在湖口响应，宣布独立，举兵讨袁，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紧随其后，皖、沪、粤、闽、湘、重庆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蒋介石因刺杀陶成章案件而逃亡日本，后见风声渐松又回到家乡溪口，闭门闲居半年多，实在按捺不住，静极思动，于1913年6月冒险来到上海，拜会陈其美，要求赴德国学习军事。此时，孙中山正命令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全国，举兵讨袁。全国革命党人也正群情激愤，将主要精力放在武装讨袁上，对追究陶案一事已较淡漠。因此，陈其美对蒋介石说：“革命危机关头正是

用人之时，介石兄何不放弃赴德念头，留在上海帮助我兴兵讨袁。倘若功成名就，不就可以将功折罪了吗？”蒋介石深以为然。

7月16日，陈其美在上海揭竿而起，被推举为讨袁军总司令，18日发表上海独立宣言，通电全国。陈其美派蒋介石到袁世凯军第九十三团做策反工作。第九十三团原本是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任团长的沪军第五团，但此时该团团团长陈其蔚已被袁世凯收买，避而不见蒋介石。蒋介石无奈，只说服了一个营的士兵参加讨袁军。蒋介石随后率领这一营兵力，配合钮永建部，夹攻上海的军事要地——江南制造局。制造局驻扎着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领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郑汝成精明强干，治军有方。而陈其美的讨袁军训练和装备极差，指挥系统紊乱不堪。郑汝成指挥的北洋军依仗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况且，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舰队，用强大炮火支援郑汝成。讨袁军伤亡惨重，被迫纷纷后撤。经过一星期殊死搏斗，讨袁军越战越弱，士兵伤亡散走大半，溃不成军，连蒋介石的营长张绍良也阵亡了。北洋援军纷纷南下，陈其美率残兵败将退守闸北、吴淞。不久，陈其美在闸北的司令部又被租界英军侵入，包围缴械。陈的旧部刘福彪也在吴淞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投降。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彻底失败。

蒋介石本想在此次举事上捞个功名，结果功名不就反倒引来一场杀身大祸。讨袁之役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不得不潜入地下。袁世凯命郑汝成仗战胜余威，称霸上海。郑汝成被袁委以上海镇守使的重任，统率两师重兵，屯扎在淞江、龙华、制造局至吴淞一线。郑汝成不惜一切代价，疯狂地镇压在上海、江浙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甚至深入租界地区，搜杀潜伏活动的革命骨干。袁世凯四处张贴告示，悬赏两千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

上海已是风声鹤唳，蒋介石无法立足，在革命党人掩护下，悄然逃返浙江。蒋介石本想去家里躲避一番，但怕溪口熟人太多，露出什么风声，反倒不好，于是转身到了离家十余华里的萧

王庙孙家舅母家里。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先后娶过三房夫人：元配徐氏，系溪口镇上白村人；续娶孙氏，系萧王庙人；再续王氏，即王采玉，为蒋介石生母，系距溪口六十里的葛竹村人。孙家舅母名叫蒋妙月，系蒋介石的族姑，亲上加亲，对蒋家一向很好，因此蒋介石感到去孙家避难较为安全。蒋介石到孙家后，蒋妙月对他的境况非常同情，一口答应让他留下来。

不久，袁世凯的通缉公文从省里传下来，命奉化县知事搜捕蒋介石，捉到后立即押送省城法办。县知事不敢怠慢，立即将此案件责成警察所干事丁志国从速办理。丁志国接案后，感到关系重大，非常棘手。因为蒋介石在奉化一带名传遐迩，妇孺皆知，而且蒋介石生性最喜“异姓昆弟之交”，在奉化县一带有不少结盟拜把的兄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实在不好对付。为慎重起见，丁志国找来好友何禄山商量。这何禄山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郑重其事地劝道：“丁兄，有道是‘人面长，铍财短’。大家都是同乡人，何必结个冤家！”丁志国深思片刻，点点头说：“言之有理。不看僧面看佛面！”

丁志国对缉蒋一事一直磨磨蹭蹭，阳奉阴违，但为了交差，每天带几名警察装模作样地下乡搜查。有一天，他们来到萧王庙。丁志国早已闻知蒋介石有可能藏在这里，进村时故意虚张声势，一路吆喝。可是，事不凑巧，待蒋介石听到警察进村的消息，警察已到了屋门口，欲逃不及，欲躲难藏，匆忙间，蒋介石冲进了舅母住的楼上。

警察们蜂拥而进，在楼下看过一遍，见没有人，就要上楼搜查。这时，蒋妙月急了，慌忙堵住楼梯又哭又闹，恳求道：“上面楼板破旧，你们都要上去，踏塌了楼板要伤人的！”蒋妙月一边说，一边把视线投向了丁志国。丁志国是个明白人，知道话中有话，便赶紧凑上前去说：“你要是怕楼板踏穿，就让弟兄们在楼下，我一个人上去。”说完，命警察们在楼下监视，独自爬上

了楼。蒋妙月无可奈何，心里就像吊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颤抖着手不停地念着“阿弥陀佛”。

楼上空空荡荡，摆设简陋，没有几件家具，除了一张大眠床上以外无处可藏人。丁志国一进门，蒋介石突然从床上坐起，低声说：“我反对军阀政府没有罪！你要邀功请赏，现在就把我抓去好了！”丁志国沉默了好一阵，不停地踱着步，突然猛地转身下了楼，一面走，一面大声嚷嚷：“上面没有人，弟兄们，我们到别处去看看。”说完领着警察扬长而去。蒋介石和蒋妙月悬了半天的心方才放下来。可是丁志国放过了蒋介石，深恐事情暴露，殃及全家老小，不久，辞职到奉化莼湖镇摆起了香烟摊。

蒋介石此次脱险后，也深感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后来，他探听到陈其美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因遭通缉纷纷逃到了日本，也想去日本躲避，但苦于囊中羞涩，不名一文，无法起身，便找到何禄山，要他帮忙想办法。何禄山把此事告诉了蒋妙月。蒋妙月对蒋介石这位内侄兼外甥寄予厚望，再次解囊相助，下狠心卖掉二十亩良田，让何禄山把所得之款转交蒋介石，资助他去日本。1913年12月间，蒋介石得以第四次东渡日本，彻底摆脱了袁世凯的追杀。

此次蒋介石之所以能脱险，应归功于两个人，一是丁志国，二是蒋妙月。蒋介石后来对此二人的恩德一直铭记在心。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打到上海后，从何禄山口中得知丁志国家境困窘，就派人送去一张委任状，命丁志国到温州去当了个税务官的肥差，对他的方方面面颇有照顾。丁志国为此段历史也专门写了一个材料，其女丁凤芝一直妥善保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丁凤芝怕被搜去作救蒋罪证，将其付诸一炬，至为可惜。

蒋介石对其舅母蒋妙月的大恩大德更是感激不尽，优礼有加。全国解放后，海峡两岸为此还进行过秘密交涉，在此不妨一叙，以飨读者。

自从萧王庙脱险之后，蒋介石待蒋妙月胜过葛竹村的亲舅母。蒋介石发迹后，每次回乡省亲必到萧王庙探望蒋妙月。蒋介石兵败大陆逃往台湾时，表示要带蒋妙月前往，但蒋妙月此时已届耄耋之年，不愿随他离乡，故仍留在家乡。

1963年，原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从外地回到家乡萧王庙镇塘湾村。汪日章的母亲与蒋介石的舅舅、蒋妙月的丈夫孙琴风是堂兄妹，两家一向常来常往。汪日章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后，又常随蒋介石到孙氏夫妇家里问候，故对蒋妙月这位堂舅母颇有感情。这年汪日章回乡后，看到蒋妙月丈夫早死，女儿远嫁他乡，膝下寂寞，晚景凄凉，动了恻隐之心，便上书周恩来总理，将蒋妙月过去与蒋介石的关系和目前处境一一说明，希望中共给予关怀和照顾。

周恩来总理对此事十分关注。经与台湾方面交涉，1965年，中央有关部门派人专程来到奉化县，蒋妙月时年已届九十六岁高龄，但身体依旧硬朗，耳聪目明，记忆力惊人。有关领导找她谈话，她还能有条有理地讲述她的外甥蒋介石与外甥媳妇毛福梅的纠葛，以及她参与调处的情况。当时海峡两岸消息不通，更不消说人员往来了。但是蒋介石对这位舅母一往情深，特许入境。于是，在做好各种准备后，蒋妙月由她的女婿王仁和陪同，被接到上海，再飞往台湾。抵台之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迎接，将她接到官邸，侍奉终老，颐养天年。此事在海峡两岸均绝对保密，故世间鲜有其闻。

三、讨袁失败再遭通缉 蒋介石避风葛竹村

1913年12月，蒋介石为摆脱袁世凯的通缉，第四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的介绍，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孙中山

这时非常缺乏军事人才，当时可以依靠的只有许崇智、邓铿、陈其美、朱执信、居正等人。其中陈其美是学警监的，朱执信、居正则文人从军。正是“蜀中无大将”之时，陈其美向孙中山推荐了蒋介石。这样，曾在日本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蒋介石逐渐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

1914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返回上海，参与沪宁讨袁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即联络一些革命党人，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军事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进攻上海。他担任第一路司令长官，在上海小沙渡设立司令部，负责潭子湾、小沙渡、梵王渡一带的进攻任务。第二路担任进攻上海真如一线。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通讯设施及钳制长江上的海军。但是未等此一计划开始行动，就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悉。5月31日夜半，闸北巡警破获小沙渡机关，搜去枪械、子弹、旗帜、文件等，多名革命党人被捕，四人殉难。

此次未遂军事行动败露后，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立即向各省发布通缉令，追缉肇事主谋者，蒋介石成为首当其冲的第一个通缉对象。袁世凯宣称：“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

蒋介石见势不妙，连忙躲到中华革命党人张静江的家中。不料，革命党人中又出了叛徒，被袁世凯收买。万万没想到，这位叛徒就是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战友、光复会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时与蒋介石一起攻打杭州城的著名革命党人王金发。原来，“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也以“国事犯”“内乱罪”被通缉，东躲西藏，难以存身。其母心疼，秘密托人到北京陆军部求情，并劝王金发进京投诚。王金发果然心动，亲赴北京见了陆军总长段祺瑞及陆海军统率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请客送礼，花了二万多元。谁知统率办事处向王金发提出了投诚免缉的条件，要求他限期拿捕蒋介石等人以自赎。王金发因此匆匆返沪，统率办事处

并派一王某随之同来，以观察其动静。王金发指挥密探，夜间到张静江家来捉蒋介石，碰巧蒋介石此时到别的朋友家去小坐，回来时发现张宅周围戒备森严，隐藏着许多陌生人，将张宅围得水泄不通。蒋介石见此情景，凭着职业的敏感立即脱身而逃，离开上海，逃回家乡奉化。

但是，袁世凯通缉蒋介石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传至奉化，空气相当紧张。蒋介石过家门而不敢入，只好跑到嵊县外婆家葛竹村（该村于 1931 年划归奉化县管辖）暂避锋芒。葛竹村四面环山，重峦叠嶂，竹林如海，天高皇帝远，向为官兵少到之地，正好藏身躲命。这里还有一位深受蒋介石信赖的堂舅。此人名叫王贤甲，绰号小汤果，熟悉乡情，交游甚广，足智多谋。蒋介石一至葛竹村，王贤甲即将他藏在家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他带到四明山石窗岩东躲西藏。

石窗岩位处四明山中心，地势险要，风景秀丽。据清光绪《奉化县志》记载：“四明山周围八百里，二百八十峰，峰峰相次，中顶五峰，状如莲花，凝近星斗。山顶极平整，有方石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历代文人骚客、方外隐士皆视石窗为仙境，在此留下无数诗文、传说。唐代诗人刘长卿赋诗云：“苍崖倚天立，覆石如覆屋。玲珑开窗牖，落落四明目。”

蒋介石在王贤甲的安排之下，以石窗为居室，避风躲雨，艰难地躲过了这次通缉。而其间，王贤甲上山下山，送衣送饭，任劳任怨，令蒋介石感激涕零，从此以后，蒋介石与之感情更加深了一层。七年之后的 1921 年 10 月 31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上午拟往葛竹省诸舅氏，十一时启行，下午四时到……贤甲舅父在唐田……（他）不远二十余里山路星夜赶回。”舅甥之情跃然纸上。蒋介石对这位救命恩人推崇备至，发迹以后，亲笔书赠“乡国重望”四个大字。王贤甲的家人也得以飞黄腾达。蒋介石把王的儿子王震南一再提拔，先后委以军政部军法司长、第三战